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综述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内容。从宏观上说,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大组成部分;从微观上说,则包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认识和思想,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具体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道路理论、革命纲领以及革命的“三大法宝”等。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只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革命道路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多取其狭义,一般均把革命道路的理论等排除在外。实际上这种理解是过于狭窄了。笔者以为,就其理论思路的合理性而言,广义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显然要更为符合这一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明显进展,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目标和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就是如此。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内涵、形成的时间和标志,以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等问题的认识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关于前者,分歧主要集中在形成标志问题上。其基本内涵和形成时间的认识,都与标志问题直接相关,甚或就是因其派生出来。“文化大革命”之前,人们普遍认同两种观点:一种是以1925年中共四大的召开为其标志;另一种则以同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其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学者研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应该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解决为其主要标准。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所在,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实在都无从谈起^①。应当说,这一标准的提出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根本把握,较为可取。

但是,问题却并未能因此而自然得到解决。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何时形成,它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共四大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有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要比四大晚些,应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其标志;还有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比这还晚,四大和四大以后虽然提出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并且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却一直并未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区别开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武装,并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之后,才能得以圆满实现。也就是说,直到1930年前后,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完全形成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能够说基本形成了。这一观点,较诸上述其他看法,显然要更有说服力。

不过,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真正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仍然存有讨论的余地。因为毛泽东等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认识及其政策策略的最终完善,恐怕一直要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得以实现。而不妥善解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问题,所谓“领导谁”和“怎样领导”的

^①参见郑德荣,董世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81页。

理论任务，也就依然不能说已经最终完成。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也已是抗战时期的事情了。所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视作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认为从党的一大到四大，经过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把这些思想系统化并加以发展，后来这些思想不断丰富，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想法，可能要更为稳妥些，恐怕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形^①。

学术界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时间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涵本身，还存在着不同理解的缘故。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领导、动力、对象、目的和前途，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五个基本点。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三方面内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概括而来，因此至今仍有不少人坚持它们，也就毫不奇怪。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则主张，除上述内容之外，至少还应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也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待。在他们看来，革命道路问题是涉及革命成败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无法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就无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就无法根本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种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所以，如不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范围之内，该理论体系就是不完备的。而且，如今人们已普遍认定，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又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那么既然如此，将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排除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容之外，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另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三大法宝”的理论其实也未尝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就预示着，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狭义理解，认同其内容的广义理解，已正在成为一种自然趋势。

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流行且得到过较多学者认同的观点，是中共二大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说，具体表现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明确分别。但这种观点的局限性，80年代以后也开始为人们所指陈。如有的学者就分析指出，“二大”既不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也未弄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两步走”的理论。其所通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只是为后来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形成确立了正确的出发点和良好的基础而已。中共科学而完整地提出这一思想，当是抗战开始以后的事情。

不难理解，考察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形成，应该首先了解这一理论本身的内涵是什么。它不仅要说明，革命应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要说明，这两个阶段的革命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应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为“两步走”理论的重要内容来理解。而从这几个方面来全面检视这一理论的形成，就应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二大和四大等，都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阶段性发展罢了，直至抗日战争中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才最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分两步走的问题。目前，这种理解，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① 参见宋汝香：《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过程》，《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

二

进入 90 年代以后,学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开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者们较为注意从宏观上来总体把握这一理论,并注重对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进行研讨、分析和辩驳。其中,沙健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论》和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表现尤为突出。前者对这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一些长期以来学界广泛使用、似无异议而实有进一步论证之必要的定义和结论,进行了深入透辟的分析和论述。如对于为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等等问题的回答,即是如此。后者则在“绪论”中,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揭示了社会发展、政治需要对政治理论的选择性。并从学术思想发展“相生相灭”的辩证法入手,深刻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中国其他思想理论的关系。遗憾的是正文部分对这一点未能设专章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它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受到了不少论者关注。一般认为,这一理论突破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上只有两种革命和两种类型国家的传统论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第三种类型的新概念、新学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了一座桥梁,打开了一个通道,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问题。这一理论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原理、暴力革命的原则、阶级分析法、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学界的意见则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包含着若干个理论,而其中必有一种理论是该体系的核心。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身必须形成体系,既理论的系统化;二是必须能够成为这个体系中其他理论的基础,或者说其他理论都是由这一理论导引而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它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理论^①。

注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将它和三民主义理论进行对比,努力揭示其彼此之间的继承与超越关系,可以说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并明确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和观点,即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董世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比较研究》^②,陈金龙的《孙中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③等。如陈金龙的文章就认为,毛泽东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六个思想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思想,而且还大量引用孙中山有关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来阐明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例如,他曾引用孙中山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指出中共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又引用孙中山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工商业政策,并

^① 参见郑德荣:《中国特色革命论析——兼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长白学刊》1992年第1期;张静如:《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

^②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8期。

表示“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①等等。基于这些细致深入的分析，作者最终得出毛泽东继承了三民主义的精华，三民主义实际上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来源的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不断有人零星地提及于此，但像这样明确地给以强调，并系统深入地予以论述的，似乎还不曾有过。

与此相关，抗战初期，中共党内掀起对于三民主义的研究热潮，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探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时，对此重要现象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在这方面，宋进的专著《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②也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关于共产国际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论者很多。其中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可以东方朔的《共产国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③一文作为代表。该文根据大量的史实，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早期理论家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始阶段，便得到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具体指导，中共二大在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无论是概念的引用还是理论的内容，都深深地打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正确指导与帮助的烙印。陈独秀更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正式使用“国民革命”的口号，以替代“民主革命”的口号，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一口号对国共合作后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探索各革命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工农联盟等重要课题上，共产国际的有关论述和指示，也为中共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养料，推动了中共对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此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也引导中共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进一步设想如何造成“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等等。显然，这一论述，对于今人深入认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外来影响很有帮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这一思想形成的当下“现代化”思想环境，也不容忽视。最近，有学者著文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论争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把握，分析了三四十年代各种繁杂的现代化思潮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思想作用，较为引人注目^④。文章认为，离开现代化思潮的整体，试图单纯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必然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是难以做出科学论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许多探索不无开创性和合理性，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工化”和“农化”之争中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工业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影响。作者同时还分析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同三四十年代的各种现代化思潮诞生于同一时代，立足于相同的国情，面临相同的矛盾焦点，受到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使得这一理论也不能不具备中国现代化思潮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如：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很少涉及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主要从批判层面去认识，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较少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等等。应当说，这样一种现代化思想视角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意义及其限度，都是不无裨益的。

随着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也逐步得到了深化。该思想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形成标志、思想内容等问题，也受到了广泛重视。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等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又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卷，第1056-1057、1057页。

^②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④ 参见张勇：《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到 40 年代初期，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①。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学界长期流行仅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标志的说法，尚不完备。

除该文之外，居于这一“标志”地位的，至少还应有张闻天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并特别强调，张闻天等所概括的“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四原则，较之于毛泽东概括且后来流行的“民族、科学、大众”的三原则，不仅要更为准确和完整地揭示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更能反映 1942 年以前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的集体共识^②。

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进行比较，探讨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则突出地反映了时代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影响。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一般认为，两个纲领在长远目标上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性质都是过渡性质，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二者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两个纲领在基本理论上一脉相承，这表现为：其一，两者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所谓“中国特色”，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实际。舍弃其一都无法构成中国特色，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来。而两个纲领都包含这两大要素。其二，在具体内容上，后者更是对前者的全面继承和发展^③。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乃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王占阳的《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理论的历史演变》^④和郑德荣、柳国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述略》^⑤两文，颇值得注意。特别是后者，专门考察和辨析了毛泽东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具有理论认识价值。文章认为，这一概念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它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它，但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论者还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一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阶段我国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认识，对于今人理解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乏启示意义。

另外，随着对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领袖群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

^① 参见张艳国：《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等文，《张艳国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参见刘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③ 参见胡凯：《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比较》，《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④ 《长白学刊》1996 年第 1 期。

^⑤ 《党的文献》2000 年第 1 期。

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具体贡献进行分析论述，也成为 90 年代以来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探索，张闻天最早对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刘少奇对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等等，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这些研究，无疑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

[参考文献]

刘辉：《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12 期。